

绘制世界文学地图

西奥·蒂汉¹著,殷国明²,刘 娇³译

(1. 鲁汶大学 比较文学系,鲁汶市,比利时;2.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200062;
3.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215123)

[摘要] 全球化浪潮下发生的世界文学学科所“标榜”的“世界性”一直受到挑战,而世界文学研究者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也会偶尔不知所措。文章追溯了世界地图绘制史,分析地域间最初的隔膜、语言或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或偏见、强势国家自觉不自觉的霸权主义等对地图绘制的影响,并将之一一“投射”到世界文学地图的绘制中,演绎并比较了几种世界文学地图,展示各时期里世界文学的具体情况,重点分析了非西方国家比较文学学者对世界文学格局的“重新定位”,最终得到以“椭圆”系统为单位、永远处在“流变”互通中的“完美”世界文学地图,将世界文学发展史映像化,以求更好地理清世界文学的发展任务和方向。

[关键词] 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地图;“中心——边缘”分立;“椭圆形”系统;文化霸权;“投射”

[中图分类号] I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4)05-0092-07

1991年,比利时比较文学学者何塞·兰伯特在他的文章《寻找文学世界地图》中慨叹道:无论是从共时层面还是从历时层面看,现有地图种类贫乏的状况都相当严重,特别是当谈到是否能涵括文学现状时,我们发现常见的政治地图、经济地图、宗教地图、语言地图等都不能完成这项任务。这些地图因为自身的规模问题也因为它们边界的故弄玄虚,常常抓不住移民、翻译、普遍型和主题型迁移与突变、生产与分配所产生的跨界流动,也不能解决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内部边界问题。何塞·兰伯特同时也指出,就是这类地图,特别是那些划分出民族国家的政治地图,在很大程度上控管着文学研究,而这种控管不仅能生出各种形式的融合与包含,更是能制造自闭与排外。^[1] 兰伯特反复使用过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自己的国家比利时(但他也举过瑞典和加拿大),比利时没有自己的语言,其文学一贯被少数派化,分列于法国和荷兰文学之下。这种情势下,“正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把用法语创作的文学(法语文学)和法国的文学(法国文学)划分成两个涵括不同内容的名目会比较容易引发误会的

法国(法语)文学更为合适,同时这两个名目也会分划出差异较大的文学“地图”。在1991年按照这些原则绘制的世界地图看起来多么遥不可及。而那以后,至少兰伯特所提及过的一些现象如“地图之外”正出现在在弗朗哥·莫莱蒂所作的一些研究中,其后续成果有1998年的《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年至1900年》、他的数篇关于世界文学的论文以及2005年的《图表、地图、树:抽象模型文学史》。

杰拉尔·卡迪尔在他的一些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文章中所说的“世界化”正与从国别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相反^[2-4],卡迪尔的观点取自爱德华·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论述文学必需的“世界性”^[5]的相关章节。当然,卡迪尔的意思是谈论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学者也应该清楚地知道“她(世界文学)源自哪里”,以免在无意中重拾全球势力的霸权主义不平衡,她(世界文学)把“世界”文学事业置于任何形式的民族文学之上就将改正这种不自觉的霸权主义。虽然这也可以说曾是歌德在1827年最初使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时的想法,但这却不是最早试图“绘制”世界

[收稿日期] 2014-07-22

[作者简介] 西奥·蒂汉,男,比利时鲁汶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

殷国明(1956—),男,江苏常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学地图的学者们心中所想的最高原则。理查德·莫尔顿在他的《世界文学及其在一般文化中的地位》中最早有意尝试“从英国角度看世界文学”^{[6]53}。他在书中直言“英国人所认识的世界文学与日本人所认识的世界文学完全不同。”^{[6]7}莫尔顿所在意的是被灌输进“英语世界的文学血统(基因)”^{[6]9}的是什么。莫尔顿的“绘制世界文学地图”写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全球化早期,却也能完美地例证卡迪尔的“强有力的发问”同样适用于当今时代:“重要的是谁在执行文学的世界化和为什么执行?”以及另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来描绘全球化大轮廓的圆规的定脚点要放在哪?”^{[2]2}

萨拉·拉沃尔在她的《阅读世界文学:理论、历史、实践》的导论中也讨论莫尔顿的一些观点,同时她参考伽达默尔对洪堡特观点的相关转述,简洁地从这个“包罗万象”世界总结出“一种语言视角对应着一种世界视角”^{[7]53}。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在她的《学科之死》中表达了她对当代世界文学文集一致用英语翻译的质疑,她在论述中没有提及伽达默尔或拉沃尔的任何观点,但斯皮瓦克显然反对视单一语言视角为通向世界文学的唯一途径。这些世界文学文集最初发行是对准了美国的学术市场,而实际上却让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占尽先机。文集自身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地图,可以说是“世界的文学”地图,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的文学”地图,其意义重大。而我们至少直到斯皮瓦克的发言,再参鉴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地位,才明白过来这些用英语写成的世界文学文集也是一种霸权地图。他们用这种不明显地潜伏在语言中的伎俩去介绍然后简化全世界的文学为本质上“用英语写成的文学”,他们还用更加隐秘地藏于语言深处的文化演化将“美国式世界文学变成‘南半球’(欠发达国家)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研究样板”^[8]。

尽管马丁·普契纳曾回应斯皮瓦克说美国出版销售的这些文集本来就只针对美国市场,而非国外市场,斯皮瓦克的论述还是系统阐明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用自己强势的意识形态向欠发达国家实施“和平演化”的投射过程。一个更早更具直接表现力的类似的霸权投射例子是法兰德斯绘图家杰拉德·德·克雷默(德语化本名)却以拉丁语名字杰拉杜斯·麦卡托闻名世界。所谓的“麦卡托投影制图法”在1569年引入绘制世界地图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海外扩张的海上航程极大地缩短了。“麦卡托投影制图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一些地理区域(特别是近赤道地区,即斯

皮瓦克所指“南半球”)的比例,而将较发达的北部区域描绘得比实际大小大得多,这样他们(发达地区)在世界范围里对南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领导地位就更加明显。此外,“麦卡托投影制图法”还沿用托勒密(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之后的习惯,先将欧洲和非洲置于世界的中间位置,再把美洲放在左边,中国和日本放在右边,这样一来美洲、中国和日本都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边缘地区。

16世纪的制图在许多方面都印证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关于1500年前后世界体系的猜想:以西欧为中心,欧洲其他部分和美洲为半边缘地区,而世界其他部分为边缘地区。这也意味着地图绘制原则的一个重要的转向:传统上宗教世界观在制图原则中占支配地位,中世纪的地图上亚洲(或东方)在最上方,接着才是欧洲、非洲,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向外扩展;而后来文艺复兴期间在众多新生知识基础上形成了“科学”世界观,并在此过程中沿着南北轴线准备“重新定位”世界。因此,“麦卡托投影制图法”及其绘制的地图也可以被视为是西方现代性将其“高等”知识转化为强权在世界地图上一路不断扩张的例证,米歇尔·福柯首先发现了这个秘密,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狠狠地谴责了西方国家的这一行径。^[9]这种直接投射在地图上的强权扩张过程,随着18世纪中期航海计时器在英国的发明,再一次成功上演。因此这种为了海外航行和贸易而发生的技术革新很快帮助英国成为当时地球上最大的殖民国家。穿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也穿过英国皇家天文台,将这条子午线标示为0度经线(本初子午线)就意味着在任何地图上大英帝国都处在中心,全世界的时间都要参照格林威治时间(GMT)推算。

当美国逐渐取得其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突出地位时,美国的制图家一边仍学“麦卡托制图法”,将北半球画得比南半球更加突出;一边开始把美洲放在中心位置,欧洲、非洲、亚洲分列周围,再一次准确地绘制成“中心——边缘”分立的地图。西方的地图绘制就这样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世界强势力量的几番转移。与之并行的还有世界文学界发生的转换:到20世纪中期前后,欧洲占据支配地位;而那以后,成就更加突出的要数美国了。而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在她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国》中声称巴黎将成为世界文学界的“格林威治子午线”^[10],她的猜想绝不是空穴来风。斯皮瓦克提议“扭转”“南北半球”的不平衡状态,她主张将“南半球”的贡献与地位提高到合适的位置,而同时并不一味压低

“北半球”的贡献与地位,以终结世界文学领域里这种无意识的霸权思维。实际上,在过去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斯皮瓦克的这种主张已经现实化到世界地图上,“颠倒”版地图风靡一时。这种地图上,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和印度通常处在中间位置,美洲占据一边,欧洲、非洲列在另一边,欧洲边远地区甚至被挤到一个小角落。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地图同样将自己放在世界的中间。实际上,不以欧洲为“卡迪尔圆规”定脚点的地图一直与上述“麦卡托制图法”地图并行于世。只不过“麦卡托制图法”随着欧洲的强势化而逐渐成为主要制图法,它对欧洲强权扩张的帮助和折射更加助长了它在制图业的气势。

对于斯皮瓦克从她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得出的“南半球”特权说(即地位提高了的“南半球”),罗伯特·温宁格认为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冒险性。他在2004年曾指出使用“麦卡托制图法”绘制的“颠倒”版地图只是反转了霸权势力的轴向,并不具备其他特殊意义。1967年出现的所谓的“高尔一皮特斯地图”^①改正了“麦卡托制图法”对各大洲陆地区域不成比例的扭曲做法,较为准确恰当地再现了世界样貌,在世界地理学科领域里极大地降低了“北半球”的重要性。在“北半球”势力(至少是欧洲中心主义)显出没落之态,大多数欧洲殖民帝国也都已经结束之时,“高尔一皮特斯地图”的发行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但“高尔一皮特斯世界文学地图”的模样会是怎样呢?

或许我们可以以大卫·达姆若什在他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中的提议作为绘图的开始:在描绘存在于两个文艺作品(也可能是两个文献)之间的关系图时,不再用只有一个重心的圆圈(即卡迪尔的有一个定脚点的圆规所画出的圆圈)去完成这项任务,而是用带两个焦点的椭圆:一个焦点代表原生地或原生文化背景,另一个代表其所进入的新环境。^[11]假设一部文学作品所能参与的关系系统有多个,那么它就有可能参与很多这种椭圆系统。这些椭圆不仅包括空间的(共时的)关系系统,也包括历时的关系系统。那么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发展方向是: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都有部分重叠的椭圆交织成一个网,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星座图。比如莎士比亚就能作为众多椭圆共用的一个焦点:从英国出发,到法国伏尔泰和司汤达

对莎士比亚和法国古典戏剧的改编;再到18世纪与19世纪早期德国A. W. 施莱格尔和蒂克父女^②对莎士比亚的翻译与研究;再到19世纪的印度殖民地高中和大学课程中莎士比亚的突出地位,等等。

照莫莱蒂的例子推测,这些关系可以图表化为在时间和空间坐标轴上的波线^[12],并最终产生一个莎士比亚在全球传播的历史地图册^[13]。这些“莎士比亚地图”也将成为更加综合性的英国文学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椭圆关系群的组成部分。罗伯特·克劳福德曾在2000年指出,在莎士比亚这一较为特殊的案例中,问题可能会复杂化:出现在印度殖民地教学课程中的莎士比亚显然是“大不列颠”帝国文化的一部分。殖民帝国大不列颠不仅让殖民地套用其政治制度,还让文化殖民不断渗透到殖民地社会中。这样后来人对殖民地的莎士比亚研究和绘图工作就要小心谨慎了,选择哪一点作为其绘图工作的出发点可能引发一些关于领土争端的问题。^[14]

当然,无论在任何给定时间上的任何给定椭圆的任一焦点上,这些地图自身都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具体的作品、作家或文学是怎样被“品评”或理解的。我们假设椭圆中较近的或处在原生环境中的焦点在一个任意给定的时刻相对静止,(尽管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极有可能发生变化),那么“较远的”焦点将极有可能发生相当大的变动,毕竟当下的作品、作家或文学有可能要面对在很不一样的文化环境中许多从未遇到过的研究目的。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能(或者需要在哪个抽象层次上才能),发掘出足够的相似度(椭圆重叠部分),去绘制置身于一系列陌生环境中特定作品、作家或文学自身所产生的新的实际存在物,这些文化环境给予他们的新解读或他们在新环境中可能遇到的有某种共通性的研究意图。例如探索怎样把莎士比亚用作正面或反面例子去支持一个正在接受中的文化背景中的已有研究基础,或者怎样去引导“创新”进入已有研究基础。那么一步一步地,在不同抽象层次上的地图们就可以诠释为能展示作品、作家或文学“全球影响力”的图表。

在前面的段落中,我都在用欧洲的例子,对地图的分析也基本上都是单向的(从莎士比亚或从英国文学,再到其他某处)。现在假定未来的文学地

① 以发明者詹姆斯高尔和阿尔诺·皮特斯的名字命名。

② 路德维希·蒂克(父)和多萝西娅·蒂克(女)。

图不会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如美国、欧美、西方或“北半球”视角)观照世界文学,也就是假定对未来世界文学地图的分析解释也不是从单方面出发。最早讲出以上观点的学者之一就是法国比较文学家、语言学家勒内·艾田蒲,他曾在1964年强烈恳请当时世界文学界“修正”他们习以为常的欧洲中心主义或欧美中心主义,呼吁将全世界都纳入世界文学的研究重点。^[15]来自地球另一边的爱德华多·科蒂尼奥在近几年指出另一种态势:近三十年来巴西比较文学的实践,甚至是整个拉美地区国家的比较文学研究,都一定要与欧洲或当代美国的作品做比较,这就使得“对欧美的过度依赖一再加重,仍统治着这片大陆的文化殖民主义获得本国的认可。”^[16]

而科蒂尼奥更进一步的言论却强调说在拉美研究比较文学的有利位置已经切换到拉美国家自身。这就意味着之前椭圆的“第二”焦点现在正在上升,拉丁美洲成为世界文学学科研究参考与比较的基点,居研究对象首位。科蒂尼奥提出“有利位置”转换的时间正好与“拉美大爆炸”的时间重合,与此同时,一批拉美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多诺索进入国际关注视野;一些早期拉美作家如阿莱霍卡彭铁尔、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以及危地马拉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等也获得认可;阿斯图里亚斯更是将“魔幻现实主义”运用到创作中,揭开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浪潮的序幕,不久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如果将从拉美发起的这场文学狂潮绘制成地图,那么久居中心的欧洲和北美都将成为“局外人”。杰罗姆·麦甘在一次讨论中,就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以巴黎为中心世界文学地图发问:假如我们判定这种“中心——边缘”分立的地图果真是只照西方眼睛的视野绘制的,并未真实地反映这个已真正地全球化了的世界的样貌,我们是否要重新审视我们所谓的“欧美中心主义”?再进一步说,假定我们后来的研究和理论得出的推论是:在当今世界,有着独立审美体系的文学神话更像是一种维持文化现状的平衡装置或一个努力维持“稳定”现状的“文化陀螺”,而与“文学地图”大相径庭,我们是否需要重新考量我们的出发点?至少在我这个边缘美国人看来,以上思考和

想法在非欧裔美国人中间颇为常见。^[17]

“高尔—皮特斯”世界文学地图不预设霸权的制高点,而用与其影响力相称的众多“焦点”的分配,同时让众“焦点”间互有联系。不像现实中各大洲的陆地是相对固定的,世界文学地图上各部分不会恒常不变。鉴于作品、作家和文学之间易变的椭圆形关系,世界文学地图会像一本历史地图册那样,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诞生之前,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的世界映像是历史横切^①的典型代表,正如她的书名《在欧洲霸权时代之前:公元1250—1350的世界体系》所示。书的第34页有一张地图,展示了在1250—1350这一百年间出现过的多种独立运转又彼此互动的经济系统。而当时的美洲、澳洲和大洋洲与世界其他地区都还没有过互动交流,所以阿布—卢格霍德的这张地图上并没有出现它们的身影。或许同时期的美洲、澳洲或大洋洲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绘制出一幅可以与阿布—卢格霍德的地图相当的地图。即使有这种可能,阿布—卢格霍德的“公元1250—1350的世界体系”还是选择涵括欧洲、亚洲和非洲。这个世界体系内部又向下分了8个子系统。有趣的是,1500年后出现的一个子系统成为后来沃勒斯坦的“真实”世界体系的中心(即囊括全世界,由一个中心支配的大系统),而这个子系统也是阿布—卢格霍德的地图上仅有的一个只与另一个特定子系统有互动交流的子系统。它以西欧为中心,从英格兰南部(羊毛产地)向外延展,越过法兰德斯(在此英国羊毛被加工成纺织品)和城市香槟集市^②(在此羊毛被换成意大利奢侈品),再到它的南部边缘意大利北部港口热那亚和威尼斯;而“西欧子系统”的仅有交流互动对象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子系统,威尼斯和热那亚又正好是“地中海子系统”的北部边缘。^[18]

“地中海子系统”与另外三个子系统互有交流:一个子系统从黑海通过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中国;另一个跨越黎凡特^③和波斯湾向南到贸易大城市马斯喀特;第三个以红海为中心,包括埃及全境,南到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阿曼和亚丁地区。“丝绸之路子系统”与“地中海子系统”一起,也与“波斯湾子系统”、“中国南海子系统”互有交流,这些子系统覆盖了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覆盖区一

① 对历史特定部分的截取以便研究和阐释特定条件下的某些原理。

② 12—13世纪法国香槟伯爵领地中集市贸易城市的统称。香槟集市是当时欧洲商品交换的重要贸易地。

③ 历史上的一个不精确的地理名称,大约指地中海东岸附近,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片区域。

直延伸到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这个“中国南海子系统”反过来也与“波斯湾子系统”有来往,这样全中国还有今天的斯里兰卡都进入了“系统覆盖区”。后来的子系统也与“印度洋子系统”交流互动,并最终也同“波斯湾子系统”和“红海子系统”取得联系。

阿布—卢格霍德的世界经济体系地图因其独特时间跨度的关系,被认为类似于维奈·达瓦德克所说的“多个部分重叠的动态地图的剪辑切换”^[19]。不过眼下我想集中于分析怎样把阿布—卢格霍德的世界经济体系地图转化成一幅文学地图,用来破坏世界文学领域中的欧洲或西方的传统观念,或者至少使传统观念相对化。

至少直到最近几年,从欧洲人视角看世界文学的发展会将欧洲作为优先关注对象,这跟几十年前科蒂尼奥绘制拉美比较文学映像过程中免不了的拉美优先化一样。换句话说,即使把阿拉伯元素引进欧洲文学,特别是途经西班牙和西西里岛,大致在阿布—卢格霍德书中“涵盖”的一段时期中进入欧洲文学,(这一引入过程已经广获认可),被引入的阿拉伯元素还是被视为部分的、次要的。因为对于欧洲人来讲,只有欧洲文学才能在实质上代表文学的行进发展。尽管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语爱情诗中跨文化元素被游吟诗人直接拿去融入到游吟诗歌中,甚至将浪漫白话和阿拉伯诗歌的混合物稍作变化调整,就摇身一变成欧洲游吟诗歌,欧洲所关注的重点仍是他们的游吟诗人是怎样让游吟诗歌从法国南部传遍大半个欧洲,而不是阿拉伯爱情诗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岛的传播过程。与前面例子如出一辙,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所创造的“短篇故事”曾为他在欧洲文学界取得一席之地。伊拉斯谟曾在1990年指出:薄伽丘的创作既参考了经典中的故事,显然也借鉴了不少流传于伊斯兰世界的故事。^[20]

我们现在再看阿布—卢格霍德的地图就会发现第一个子系统所覆盖的区域——“欧洲”,实际上处在更加繁荣的“地中海子系统”的外围受惠区。“地中海子系统”的覆盖区主要是流传着古谚语“文化随着贸易而行”的穆斯林世界。它与同样繁荣的“红海—波斯湾子系统”互通贸易,不断地传送着“印度洋子系统”的财富。这也就意味着阿布—卢格霍德的几个“在欧洲霸权时代之前的世界”之间

的交流以相互接壤或偶然重叠的区域为媒介地,也常常就是最令人振奋的发展和革新的发生地,而这个过程有可能就如阿普特所说的是在各种误传误解或互不理解的基础上逐渐进行的^[21]。那么我们此时再转回“世界文学”的视角去看,就会发现欧洲文学并不是整个大系统中任何发展过程的首发一步,而仅仅是上中古时期里世界繁华大家庭的一个“穷亲戚”,世界文学的启动力量在别处。用更为古派的话来说就是来自更强“世界”的“影响力”发源于别处(而非欧洲),只不过其浪潮的边缘波及到欧洲罢了。

“非欧裔美国人”^①群中的作家们也很快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印度—孟加拉作家阿米塔夫·高希在他的《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精彩地阐说了西方“在地图上”和东方“在地图上”的迥异之处,或者说对比了阿布—卢格霍德的几个1250~1350子系统与20世纪90年代初乔治W. H.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体系的不同。高希在书中写了两个平行故事:一个写12世纪在开罗一个犹太商人的故事;另一个是高希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人类学家身份留在埃及的见闻,及第一次海湾战争^②期间他又回到埃及的故事。^[22]12世纪的犹太商人本·易咎四处游历,从摩洛哥到印度,到商品、人员、文化自由流通、社会和宗教宽容管制的地方。而在20世纪晚期,这片土地却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直到最近几年,这片土地上的欧洲殖民残留仍各自占据一方,通往自由的路上荆棘遍布。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西方世界的代表——美国,在本·易咎的时代根本还没出现“在地图上”;美国的上一任“世界统治者”——欧洲在12世纪本·易咎的世界中全然上不了台面;12世纪支配全世界的是伊斯兰世界。

混血作家贾马尔·马乔布^③的《承运人》(1998)也是设定了两个不同的时代背景。当下时代的哈桑是一位阿拉伯裔的丹麦学者,他研究的关于17世纪早期的课题(也许是虚构的)——一个游历到丹麦的土耳其摩尔人拉希德·阿—肯兹的故事——构成第二时代背景下的故事主体。^[23]马乔布的小说再次向我们展示了不同认知系统中的人在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相对不足时,同样都会产生认识偏见:在阿—肯兹的原有认知中,欧洲与奥斯曼大

① 即上文麦甘

② 时间为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28日。

③ 苏丹与英国混血。

帝国相比,简直是野蛮人居住地;而17世纪欧洲人所说的可恨的“突厥”正是阿一肯兹的出生地。高希和马乔布的小说正回答了为什么塔米姆·安萨里的《中断的历史》要以“伊斯兰眼中的世界历史”^[24]为副标题。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同上述见解一致的学术性著作。书中假定上述“偏见”的真实性,为避免可能的“偏见”,转而去谈论文学椭圆中“更远的”焦点——东方。鉴于人认知系统深处不自觉的“偏见”,这样费时费力的研究方法也许并不为过。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萨义德并未使用“自由阅读”,而这种“自由阅读”被达姆若什看做为典型的世界文学。相反,萨义德倒是认为他的西式东方学的阅读已经非常的“世界”或“客观”、“全面”了。同时西方的读者如果顺着萨义德“正统的”东方学逻辑走,就会发现他们正站在实际上距自己“更远的”那个焦点上,而且被迫要把自己从自己文化潜意识中的预设看法中剥离出来。

有人认为萨义德所抨击的伪东方学的出现,正是因为同一时期里经济霸权的转移:即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所认为的最自然而然的世界经济中心——与中国和印度庞大的“人口—经济”体相连的系统^[25],转移到欧洲,而我们直到今天都处在一次经济中心大反转的过程中。也许撤销以上观点是必要的。保罗·肯尼迪早在1987年就反驳了“美国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说法,他认为那只是一个短暂的幻象,只是因为美国正好是二战后唯一没有崩坍的西方势力这一巧合,才会有人相信“美国中心论”。^[26]而“911”以后更是没人再去指责保罗·肯尼迪当时的睿智和远见,随后美英带头侵占伊拉克和阿富汗、美英今日的失和,还有2008年的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都证实了“美国中心论”的错误。如今“东方”的崛起——中国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以及紧随其后的印度的崛起——已经不容忽视。

在不远的未来,迅速崛起的中国势必要“重新定位”世界格局,重绘世界版图,当然也要改写世界文学地图。中国已经在大力向外传播其语言和文化,政府出资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和中华文化,这正和早年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如英国文化协会、法语联盟、歌德研究院、塞万提斯研究院以及贾美士学院等机构的性质一样,是他们设在海外的本国文化传播据点。不过中国这样一个新的重要角色的加入也给世界文学带来了一

个新的制高点,而且新制高点并不处在迄今为止的主导中心,这样世界文学研究的过去和当前状况就能得以重新审视。从长远来看,中国所带来的新体系可能会把“老式”的欧美体系逐步排挤到边缘地带。中国这个新角色其实是个真正的老玩家,中国文学显然也是如此。此外中国愈发高涨的自信心和日益增长的文化辐射力可能会逐渐唤起它的古老价值观——中西对立。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从次要“制高点”看,文学的“世界”也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暂时还不足以完全推翻现有体系。例如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在铁托的国家南斯拉夫发起的“不结盟运动”^①竟然导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文学的“联盟”。

现在我们就解释一整个系列的地图了:它们跨越处在不断演变过程中的文学系统,部分重叠又不断移位,变化又常常发生在系统与系统的交界处或部分重叠处,其中一些变化迅速,另外一些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保持相对稳定。变化的快慢有时会导致某一个系统变得比其他系统更加“高效”运转,因此而扩展得更快更广,甚至于演变成霸权侵略式的扩张。例如19世纪中期的欧洲小说的强势;再如欧洲及美国的文学理论系统向非西方文学强加以规则和规划,暗中用与欧洲文学一致或不一致的标准来评判指点非西方文学(特别从落后、现代性、完整度以及其对立面等方面加以暗示),擅自判定什么是世界文学,并在大多数情况下认为“世界”就是“包罗万象”的意思(这并不是歌德最初的Weltliteratur的意思)。如果我们想在世界文学的广阔天地里获得一个更全面、更广阔的视野,而不被束缚在任何“霸权主义圆规的定脚点”上,那么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一个上文所涉及到的“投射”过程都该成为填补世界文学地图的一部分,逐步将世界文学地图扩展为世界文学历史地图集。

[参 考 文 献]

- [1] 何塞·兰伯特. 寻找文学世界地图[M]//H. 基特尔, P. A. 弗兰克. 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 柏林: 埃里希·施密特出版社, 1991, 133—144.
- [2] 杰拉尔·卡迪尔. 为了世界, 为了全球化——比较文学的十字路口[J]. 比较文学研究, 2004, 41(1): 1—9.
- [3] 杰拉尔·卡迪尔. 世界比较文学变得 Tlön[J]. 比较评论研究, 2006, 3(1—2): 125—38.

① 简介不结盟运动, 铁托是领导人之一。

- [4] 杰拉尔·卡迪尔. 围城启示录:文化可持续的生命线[M]. 加州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11.
- [5] 爱德华·萨义德. 世界、文本和评论家[M]//世界、文本和评论家. 马萨诸塞州剑桥, 哈佛出版社, 1982.
- [6] 理查德·莫尔顿. 世界文学及其在一般文化的地位[M]. 马萨诸塞州诺伍德: 麦克米兰出版社, 1911.
- [7] 萨拉·拉沃尔. 阅读世界文学:理论、历史、实践[M]. 德克萨斯州奥斯丁: 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 1994.
- [8]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 学科之死[M].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3: 30.
- [9]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M]. 纽约: 万神殿出版社, 1978.
- [10]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 文字的世界共和国[M] 马萨诸塞州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9.
- [11] 大卫·达姆罗什. 什么是世界文学[M].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3.
- [12] 弗朗哥·莫莱蒂. 图表、地图、树[M]. 伦敦: 维索出版, 2005.
- [13] 弗朗哥·莫莱蒂. 1800—1900 欧洲小说地图[M]. 伦敦: 维索出版, 1998.
- [14] 罗伯特·克劳福德. 让渡英语文学[M]. 爱丁堡: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 2000.
- [15] 勒内·艾田蒲. 我们是否应该修改世界文学的概念?[S]//论(真正的)总体文学. 巴黎: 伽利玛出版社, 1975 [1964, 1966].
- [16] 爱德华多·科蒂尼奥. 拉美比较研究: 塔尼亚·弗朗哥·卡瓦哈尔的作用[M]. 比较评论出版社, 2010, 7(2 - 3): 367 - 79.
- [17] 杰罗姆·麦甘. Pseudodoxia Academica[J]. 新文学史, 2008, 39(3): 645—56.
- [18] 珍妮特·李普曼·阿布—卢格霍德. 在欧洲霸权时代之前: 公元 1250—1350 的世界体系[M].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1.
- [19] 维奈·达瓦德克. 世界地理: 文学与文化的新位置[M]. 纽约: 劳特里奇出版社, 2001: 3.
- [20] G. 伊拉斯谟. 薄伽丘《十日谈》故事的印度来源[M]// 阿布汗毛里雅(主编). 印度与世界文学新德里: 印度文化协会出版, 1990.
- [21] 艾米丽·阿普特. 翻译不可: 世界体系[J] 新文学史, 2008(39): 581—598.
- [22] 阿米塔夫·高希. 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M]. 伦敦: 格兰塔出版社, 1992.
- [23] 贾马尔·马乔布. 承运人[M]. 伦敦: 凤凰出版社, 1998.
- [24] 塔米姆·安萨里. 中断的历史: 伊斯兰眼中的世界历史[M] 纽约: 公共事务出版社, 2009.
- [25] 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M]. 伯克利: 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8.
- [26]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M]. 纽约: 兰登书屋, 1987.

(责任编辑: 程晓芝)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THEO D'hean, translated by YIN Guo-ming, LIU Jiao

(1.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ouvain University, Leuven, Belgium; 2.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3. School of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World literature has long been challenged for its so-called “world”, while scholars of world literature themselves couldn't give out a proper answer. This article firstly traces the history of world map, showing us how the initial gap between areas, linguistic misunderstanding or cultural prejudice and unconscious hegemony could affect map making. Then it “projects” these factors on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deducing and comparing some world literature maps. After that, it displays specific situ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periods, selectively analyzing the “reloc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pattern made b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lars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Finally,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erfect world literature map would be a group of “ellipse” systems, which forever change over time or space. This perfect map makes the evolu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become image, which helps to clarify its tasks and directions better.

Key words: World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Map; Center/Periphery; “Ellipse” System; Culture Hegemony; “Project”